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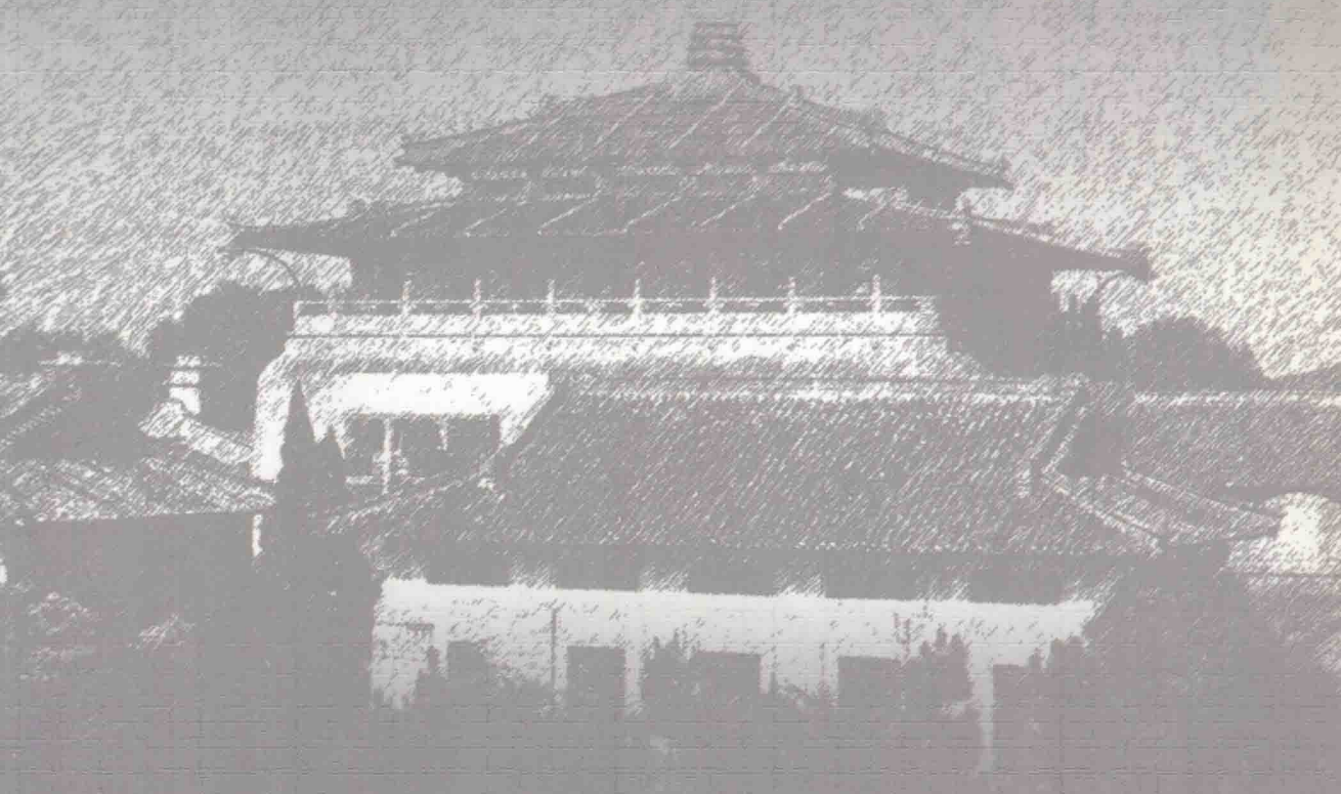
长江学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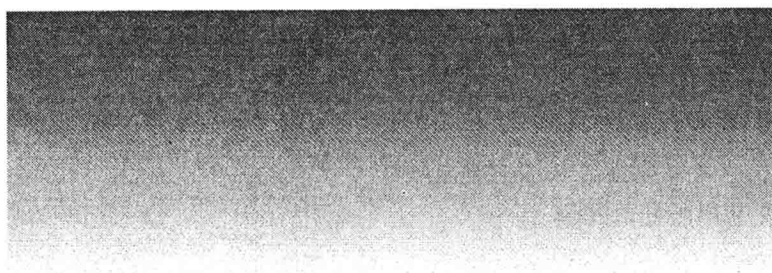
第七辑

武汉大学文学院
长江文艺出版社

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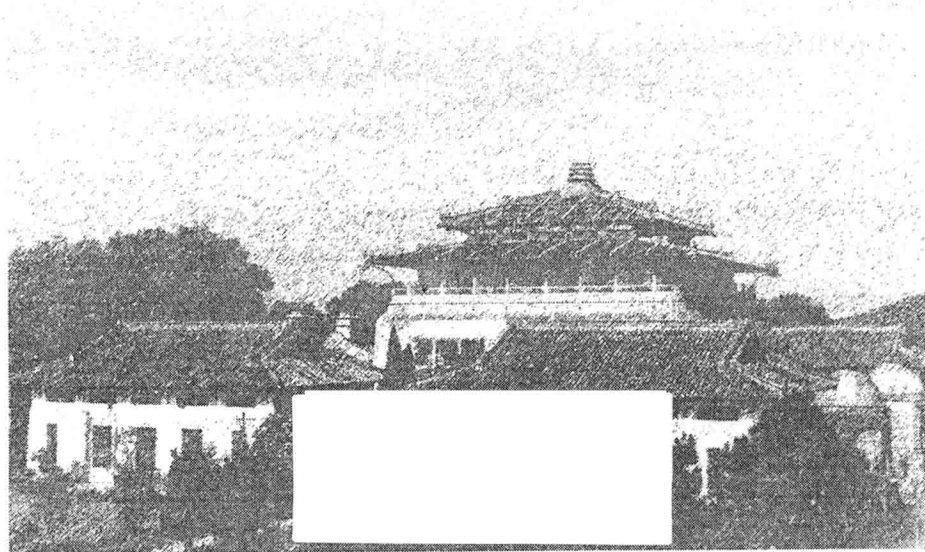


长江学术

第七辑

武汉大学文学院
长江文艺出版社 编

CHANGJIANGXUESHU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江学术/武汉大学文学院、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ISBN 7—5354—2332—9

I. 长…

II. ①武…②长…

III. 学术论文—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0013 号

责任编辑:常 江 责任印制:吴竹敏

封面设计:小 加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1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市精伦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9.125 插页:1

版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530 千字 印数:1-2000

I .1794 定价:35.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8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孙觉伯 男, 1934年12月生于武汉。抗日战争爆发

的第二年, 日军进逼武汉, 随父母回老家湖北黄州城外桐梓岗。6岁上学, 先后在黄州凉亭私塾、黄州镇立小学、省立黄冈中学读书。1952年初, 考入湖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 同年10月毕业, 先后在胜利县委办公室、黄冈地委办公室工作。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五年制本科。1961年毕业, 旋即师从本系刘绶松教授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64年研究生毕业留系任教员。1988年晋升为教授。1995年担任博士生导师。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兼任《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理事、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闻一多基金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会主任。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他为人通达, 治学谨严。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在鲁迅、郭沫若、闻一多研究方面用力尤勤, 取得了较突出的成果。主要著作有《郭沫若评传》、《中国现代两大文豪论》、《鲁迅及其作品》(合著)、《论鲁迅前期思想》(合著)、《中国现代文学史》(合著)等, 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中,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评传》被北大编的《中国20世纪文学论著提要》作了介绍, 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他曾参加新版《鲁迅全集》、《郭沫若全集》的注释工作, 主持国家项目“闻一多遗著整理”, 主编(另有一位主编)新版12卷本《闻一多全集》, 又与另外两位老师共同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大辞典》。其研究成果获得第二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第八届中国图书奖、湖北省首届社科优秀成果荣誉奖、全国首届闻一多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武汉大学社科优秀成果奖等多项奖励。

熊礼汇 1944年9月出生于湖北省公安县黄龙乡。

1964年7月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 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业方向为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和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研究。

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 熊礼汇即师从黄焯、刘禹昌、李健章先生研习古代散文。在已发表的80多篇论文和已出版的20多种著述中, 多数为古代散文研究成果。

《先唐散文艺术论》(上、下)和《明清散文流派论》, 是熊礼汇研究古代散文的代表性专著。谭家健先生撰写书评说: “此书(指《先唐散文艺术论》)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积极的尝试。”“无论资料之丰富翔实, 见解之独创新颖, 分析之透辟精到, 皆达到了当前的最佳水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熊著把当代古典散文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是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散文史著作中最富有创意的

成果之一。”宁俊红先生在《20世纪古代散文批评范式的演变与反思》中, 把《先唐散文艺术论》当作“20世纪后半叶古代散文艺术研究第三阶段”的代表作, 认为“熊礼汇从古代文论中总结出了构成古代散文文学性、艺术美的五个质素, ……是在借鉴古人基础上具有创造性的总结。五种质素构成了一个较完满的系统, 为研究作家作品的整体艺术风貌, 提供了可靠的途径”。他还举例说: “这样的研究可谓细致, 也颇具新意和说服力”。

韩晓生评论《明清散文流派论》说: “此书既是一部研究明清散文流派的力作, ……更兼内容丰赡, 论证透辟, 话语流畅, 时露机锋, 读来令人收益良多。”刘勇强教授在书评中说: “熊礼汇教授对古代散文素有研究, ……他的《明清散文流派论》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之作, 并顺势将明清散文的研究提升到新的台阶。如在论及唐宋派时, 作者提出了唐宋派对秦汉派双重超越的重要命题。……这些观点, 有驳有立, 理据兼备, 反映了当今学术界对这一流派的新认识。”周群先生则认为该书“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看法, 更是言人所未言, 自成一说”。

熊礼汇独立完成的著述还有: 1、《中国文学史》(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部分); 2、《新译淮南子》(上、下); 3、《唐宋八大家文章精华》; 4、《袁中郎小品》。主编的著述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精选丛书”(共十本)、《明清散文集萃》和“经营管理智慧丛书”(共六本)。与人合作的著述有《新选唐诗三百首》、《千家诗新注》、《古文观止注译》、《历代山水诗选》、《唐五代传奇集》等。

熊礼汇1992年曾在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讲学两个月, 2002年10月曾应邀到韩国晋州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并在汉城大学中文系作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学术报告, 2003年12月曾在澳门出席学术会议。



李中华 1944年生，湖北随县厉山镇人。1967年毕业于

武汉大学中文系本科，1978年返校攻读中国古代文学，毕业后被授予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2001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

李中华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出版著作有《诗经主题辨析》（与杨合鸣教授合著）、《楚辞学史》（与朱炳祥教授合著）、《词章之祖——楚辞与中国文化》等。接受约请整理注释《抱朴子内外篇》、《六祖坛经》、《禅林宝训》等古籍，均由台湾三民书局出版发行。曾参与《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武汉出版社，2003）、《中国文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等的编撰。



在近、现代激烈的社会动荡与学术变迁中，李中华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治学态度与学术理念：一是希望继承前辈学者严谨笃实、独立不倚的治学精神，好学深思，持之有故，庶几薪尽火传，发扬光大民族的文化传统；二是力求融汇中西、贯通学术、拓展方域、探讨新义，故著论多联系时代思潮、宗教文化、士林风气，不甘拘守一隅，试图有所创新。历年在各类报刊共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包括以下内容：一、认为特定时代的社会状况、学术思潮制约并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与宏观风貌，在这方面发表有《汉魏学术思潮与建安文学的繁荣》（武大学报，1989）、《试论李商隐的无题诗》（唐代文学论丛，1987）、《晚唐温李诗风评议》（武大学报，2002）等文章；二、认为封建时代的皇权专制所导致的朝政纷争酿成了无数文人的悲剧，主张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揭露并清算封建专制主义的罪恶，在这方面发表有《从‘三曹七子’到‘二十四友’》（武大学报，1995）、《肃宗朝政局纷争与李杜的悲剧命运》（武大学报，2003）、《李商隐与牛李党争》（文史十七辑，1983）等文章；三、关于宗教民俗与文学的联系，发表有《楚辞：宗教的沉思与文学》（武大学报，2001）、《先秦招魂习俗与招魂》（光明日报，2004年7月）等文章；四、关于古代文论，发表有《王船山、顾亭林、黄梨洲文学观之异同》（船山学报，1989）、《赋心、诗心、词心、文心》（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002）等文章；五、关于文学考证，有《“竹林之游”事迹考辨》（江汉论坛，2001）、《晚唐“三十六体”辨说》（文学遗产，2001）等文章。



孙东临 笔名石观海，山东招远人。1969年吉林大学

中文系本科毕业。1979年考为吉林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研究生，师从学者、诗人公木（张松如）教授；1982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至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历任武汉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实验班教研室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副主任，现为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武汉大学中日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曾数次东渡，先后在长崎县立大学、岛根大学、创价大学、嘉悦大学等日本高校任教或客座研究多年。

在承担先秦两汉文学史 ze 教学工作的同时，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及中日比较文学、文化的相关研究。主要著作有《宫体

诗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日人禹域旅游诗注》（武汉出版社）、《二十五史白话类编·政治首领术》（辽宁古籍出版社）、《中日交往汉诗选注》（与李中华合撰）、《先秦散文精华》（与人合撰，朝华出版社）、《中华小百科全书·文学卷》（副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汉魏文学编年史》（即出）等。主要译作有《万叶集与中国文学》（武汉出版社）、《吉川英治——作家与作品》（武汉大学出版社）、《青果》（漓江出版社）、《日本新天皇》（春风文艺出版社）、《节奏的美学——日中诗歌论》（与加藤阿幸等共译，辽宁大学出版社）等。主编“日本当代著名女作家林真理子精品系列”丛书（第一辑十种，漓江出版社）、主编《道德文章 高山景行——张松如（公木）教授纪念特集》（吉林大学出版社）。另在中、日杂志发表论文、译文多篇。

孙东临教授勤恩授业，扎实治学，曾获湖北省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0）、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2001）。所著《宫体诗派研究》在学界颇得好评，学者认为该书“填补了中国诗歌史研究中的一大空白”（刘勇强《流派研究的文学史意义》），“提出的许多新观点，精辟而富于启示性。”（罗小东《古代文学流派研究的拓展与深化》），“无疑是一个新的发现，把过去为人们忽视的一面给揭示了出来，我们不能不重新审视南朝以前的诗歌。”（王小舒《一部为宫体诗正名的力作》）所译《青果》文笔流畅，兼达信雅，被南国报纸选为连载小说。

长江学术

学术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松山(德国) 川合康三(日本) 王 宁 王润华(新加坡) 乐黛云
叶嘉莹(加拿大) 朴宰雨(韩国) 严家炎 陆耀东 李欧梵(美国)
何莫邪(挪威) 易竹贤 岩佐昌璋(日本) 郑远汉 宗福邦 项 楚
郭锡良 袁行霈 钱中文 章培恒 裘锡圭

编委会:

主编:

尚永亮 周百义

副主编:

於可训 卢烈红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冯学锋 刘礼堂 张思齐 张荣翼
骆瑞鹤 黄义和 熊礼汇

编辑部主任:

乔惟德

本辑执行主编:

卢烈红

目 录

跨文化对话

中学西渐与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的中国根源》述评·····伍英姿 昌 切 (1)

文艺学研究

以“文”为美

——中国古代美学的形式美论·····祁志祥(19)

网络文学的消费表达与价值限度·····欧阳友权(29)

试论文学的文学性

——从别林斯基和俄国形式主义谈起·····唐铁惠(36)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论晁补之的七言绝句·····陶文鹏(45)

论孟浩然律诗之多不合律

——近体诗形成的盛唐环节·····木 斋(53)

传世经典的致用和创新·····张高评(61)

前七子文复秦汉说的提出及其西北派渊源问题·····黄卓越(71)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胡适新诗创作的历史定位·····陆耀东(78)

魏晋风度与当代文学·····樊 星(92)

1956—2003:王蒙研究初论·····丁玉柱(102)

回到隐喻之前

——于坚诗学与创作·····夏元明(113)

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研究

- 论维柯《新科学》的逻辑运思及其审美启示·····马小朝(120)
- 西方模式影响下近代中国侦探文学的嬗变·····袁洪庚(127)
- 试论林林的俳句翻译理论与实践·····胡仰曦(137)
- 《尤利西斯》与《喧哗与骚动》对读·····刘登东 刘亚波(147)

文献·考据

- 张自烈里籍考·····陈海波(155)
- 南朝宋郭缘生《述征记》考
——《水经注》征引文献研究之一·····鲍远航(160)
- “长河”与王维《使至塞上》中的几个问题·····尙永亮(173)
- 《战国策》讹字解析三则·····牛鸿恩(176)

古代汉语研究

- 玄应《众经音义》俗语词考·····徐时仪(180)
- 《周易》经、传中未见于《汉语大词典》语词考
·····赵振兴 陈 灿 顾丹霞(188)
- 《文选》李善注引《方言》考异·····柏亚东 华学诚(196)
- 转折副词“可”与“却”的连词化进程·····席 嘉(205)
- 《文心雕龙》关于篇章的语音模式联接观·····张延成(214)

现代汉语研究

- 反义语素合成词·····郑远汉(218)
- 仿拟和戏拟:形式、意义、认知·····谭学纯 朱 玲(223)
- 说“夏天着”·····赵 俐(232)
- 郑远汉汉语风格学学术思想评介·····肖元珍(239)
- “感叹中心”谈·····杜道流(244)

硕博论坛

- 狂欢背后的孤独·····易文翔(249)
- 体验中的“象征”·····张 克(253)
- 五四反传统主义文化策略的再审视·····赵黎明(258)
- 考求词的内部形式的意义和方法·····李书超(265)
- 杜甫《新婚别》“拜姑嫜”礼说·····黄 震(270)

珞珈书林

还宫体诗一个公平的历史地位

- 评石观海的《宫体诗派研究》·····杨春时(273)

回归与超越

- 浅谈《先唐散文艺术论》、《明清散文流派论》对古代散文

- 研究方法的探索·····泽 平 戴 虹(276)

汉语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 评《汉语史论文集》·····吕 成(279)

学术短论

- 浅谈吕祖谦的古文结构艺术观·····红 贤(179)
- 手机短信中的设歧·····王 红(243)

学术动态

- 海峡两岸中国语文教育学术研讨会综述·····程学兰(282)

在融会与创新中深化

- “2004 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李 松(285)

汉语词汇学首届国际学术讨论会暨第五届全国研讨

- 会纪要·····陈 慧(288)

第七届全国古代汉语学术研讨会暨简帛文献语言

- 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李丽平(292)

技术化社会与汉语文学的文学性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 澜(296)

《长江学术》稿约

主持人的话

“跨文化对话”是事实也是期待。事实是这种对话已是不用期待的现实，期待是因为这种对话可能有更好的前景。事实需要清理，期待需要探索。我们希望在事实清理和理论探索中蹚出一条路。开栏的这篇文章，是对已故美国著名思想史家洛夫乔伊的论文《浪漫主义的中国根源》的述评，洛夫乔伊用详实的材料证明：欧洲的“浪漫主义转向”得益于（欧洲人的）“中国观”的刺激和推助。浪漫主义是“互文性”或间性的文本而非单一文化的西方文本。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昌 切

2004年7月28日

中学西渐与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的中国根源》^①述评

伍英姿 昌 切

提到浪漫主义与中国的关系，人们自然会想到自清末以来中国的文学艺术如何输入、接受和转化源于西方的浪漫主义，并能轻而易举地举出大量无可辩驳的实例。实际上，作为舶来品的浪漫主义并非纯粹的“西方货”，里面竟有从中国引入的东西，而这一点，恰恰是鲜为人知的。把视野仅仅局限于19、20世纪的中西交通史，只注意西方对东方单向的影响，是不可能看出浪漫主义固有的“互文性”来的。如果打开眼界，回溯到16—18世纪的欧洲，探查浪漫主义的来踪去脉，那么我们会看到，在中学西渐的过程中，中国人的园林（建筑）观或审美观曾经怎样“震惊”（本雅明语）欧洲，并推动和助成了欧洲文学艺术的“浪漫主义转向”。《浪漫主义的中国根源》之所以引起我们的浓厚兴趣，就在于它生动有力地“再现”了这样一段让我们既感生疏又感亲切的审美思想史。

这篇文章的作者阿瑟·洛夫乔伊，是著名的思想史家，被誉为“美国思想史之父”。他曾在斯坦福大学、华盛顿大学、密苏里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创办《思想史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著有《巨大的存在之链：思想史研究》（*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思想史论集》（*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等。在他看来,任何思想观念都会随历史演化,其意义不可能一成不变;思想观念可以分化为不同的部分,不同时代的人们会将这些部分进行不同的组合。浪漫主义自然也不例外。他认为人们在使用浪漫主义这一概念时,对于历史变迁所带来的模糊性缺乏清醒的认识。他在《浪漫主义的中国根源》中所做的工作,就是回到 16—18 世纪中学西渐的历史情境中,探寻浪漫主义涵化“中国观”的踪迹。

浪漫主义是对新古典主义的反动。继承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风格,欧洲的新古典主义也奉“规则”为圭臬,在艺术上强调秩序、对称和均齐。因此,要讨论浪漫主义,必须先了解其生成背景,也就是说,必须先了解新古典主义。在洛夫乔伊看来,值得注意的是以下三人对新古典主义要义的阐发:

一是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②关于美的定义:

事物的和谐即美,使人赏心悦目。美是自然形成和约定俗成的。自然缘于几何学,均齐(即均等)是其构成形态……自然美或几何美总能得到验证。几何形象当然比其他任何不规则的形象更美,与自然法则完全相通。(引自 L·韦弗尔(L. Weaver):《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1923 年,第 150 页)

二是约翰·丹尼斯^③关于诗歌的论述:

如果说诗歌最终是要引导和改造世界,即把人类引离不规则和混乱并带向规则和有序,那么很难设想不规则和极端的東西如何能达此目的……每一种理性创造物都必须从规则中获取美,因为理性就是规则和秩序,而且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是不规则的……偏离规则就是偏离理性……人类必需的作品越是完美,就越接近造物主的杰作。宇宙的每一个部分都是规则的,正是确当的规则性使之拥有了绝妙的美。《《诗歌批评的基础》(The Grounds of Criticism in Poetry),达勒姆:《批评文集》(Critical Essays),1700—1725 年)

三是约瑟夫·班克斯爵士^④对自然的赞叹。班克斯爵士于 1772 年前往冰岛探险,在斯塔法岛上发现了芬戈尔洞穴。他在洞中看到的石柱,几乎与人类建筑的形式一模一样,整齐有序地排列在两侧。自然物居然也这样讲“理”,他对此大加叹赏:

与自然相比,人造的教堂和宫殿又算得了什么!在自然造化面前它们太渺小,只不过是些模型和小玩意罢了。建筑师凭什么自负!规则曾经是人类假想的惟一优于自然情妇之处,现在我们看到,规则也为她即自然所拥有,而这多年来从未被人描述过。这不正是研究艺术起源的学院吗?整个希腊学院为此添加了什么?人类在圆柱顶端所做的装饰不过是对自然的模仿,所以我们才会在那里看到茛苕叶丛。自然给予研究她

的辉煌作品的人的回报该有多么丰厚！（“约瑟夫·班克斯爵士的斯塔法岛记”，载于托马斯·彭南特（Thomas Pennant）：《苏格兰与赫布里底群岛游记》（*A Tour of Scotland and Voyage to the Hebrides*），1774年）

雷恩、丹尼斯和班克斯都推崇自然，但这个自然并非单指大自然。“自然就是真实，因为它就是‘情理之常’。新古典主义者都坚信‘艺术模仿自然’的原则，而且把自然看作是与真理同一，由理性统辖着，这就是自然的普遍性和规律性”^⑤。在他们那里，自然蕴涵理性或规则，是“真”与“美”的统一，人类要顺应自然，就必须遵从理性，遵循规则。事实果真如此？洛夫乔伊表示怀疑，因为当人们面对真实的自然景观时，是很难认同约瑟夫·班克斯爵士的论断的。洛夫乔伊对新古典主义基本原则的怀疑，实际上正是浪漫主义叛逆新古典主义的起点。

浪漫主义根本不相信自然中存在什么理性或规则。规则、均齐，清晰可辨的平衡、平行，在新古典主义那里是艺术品主要的优点，而在浪漫主义那里却是主要的缺点，浪漫主义崇尚的是不规则、不对称、变化无常、惊异，所规避的是新古典主义所推崇的单一和统一。审美标准的这一变化主要发生在18世纪，先是广泛出现在其他艺术中，继而逐渐波及到文学审美领域。洛夫乔伊认为，在其他艺术中，18世纪审美趣味和艺术实践中的四种新现象出现在初期浪漫主义之中，并推进了浪漫主义运动。它们是：1、克劳德·洛兰、普桑和萨尔瓦托·罗萨^⑥热衷于风景绘画；2、英国园林或所谓“天然”园林被广泛介绍和扩散，这种园林也许是18世纪的艺术精华；3、1740年代经巴蒂·兰利和桑德森·米勒^⑦的努力，哥特艺术开始在英国复兴；4、特别崇尚中国园林，也崇尚中国建筑和其他艺术的成就。

这四种尤其是后三种现象与18世纪的思想紧密相连；而第二种与第四种现象确实是完全混融在一起的，以致出现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单一指称——“英华趣味”（*le goût anglo-chinois*）。二者之所以被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它们样例相称，遵循18世纪上半叶艺术大师和批评家所表达的同一基本美学原则。艺术家多方运用不规则的形式，对自然进行多样的模仿，而这里的自然不再是几何形的、秩序井然和规整划一的自然，而是自由天成、“野性”和变化多端的自然。作者把中国园林、建筑等艺术与英国园林、风景绘画、哥特艺术并置，以揭示浪漫主义的成因和动向，耐人寻味。在四种相关的动向中，前三种已被通行的审美思想史论著和近期学者出色的研究所论及，如曼沃宁（Manwaring）的《18世纪英国的意大利风景画》（*Italian Landscape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和克里斯托弗·赫西^⑧等人的有关论述，而最后一种，虽多为一般的国别史所描述，但就洛夫乔伊所知，还没有人从研修思想史学生的立场出发来详加讨论。即使有所讨论也只是表面的，没有追溯这种风尚形成的真实根源，也没有划分出历史阶段，更没有对其历史意义作出公正的评价。

《浪漫主义的中国根源》表明，中国园林的风格对欧洲人的审美观念和审美风尚所施加的影响，要早于斯威策^⑨、肯特^⑩、布朗^⑪和布里奇曼^⑫给出的新的园林模式，甚至要早于蒲伯^⑬和艾迪生^⑭在18世纪头十年表达的新的园林理想。“无序美”（*beauty without order*）显然被当作中国人的审美观念（体现在中国园林中）首先由一位重要的英国作家提出。英国园林的趣味大半要归功于先前对中国园林的理想化。崇尚中国园林之风经久不息，在18世纪刮了七八十年，虽然这种持续性的影响也许并不如前已提到的其他三种新的审美风尚来

得有力。哥特观（Gothicism）曾一度与中国趣味（goût chinois）紧密相关。在 1770 年代，一种新的有关中国园林及其他艺术审美目的和原则的概念被引入，唤起了英国人对中国园林的热情。

人们通常认为 18 世纪英国园林与哥特艺术的复兴对浪漫主义的兴起产生了巨大的作用。18 世纪开始，英国园林艺术家肯特、布朗等人摆脱法国、荷兰规则园林的影响，师法自然，追求随意性、自由性和多边性，创造了英国园林。英国园林思想中就含有浪漫主义特质。18 世纪后半叶建筑和文学上的“哥特”风格诉诸感觉，将人们带入怪诞、可怖的审美境界，也体现了浪漫主义的特色。洛夫乔伊通过大量实例证明，中国园林及其他艺术曾经怎样对英国园林、哥特艺术施加影响，从而促成了欧洲审美思想史上的浪漫主义转向。

二

欧洲人从中国园林及其他艺术中获取灵感和滋养并非偶然。

从 16 世纪末到 18 世纪末，中国文明在欧洲始终享有盛誉。甚至在北京耶稣会设立以前，探访中国的传教士和航海家就最早向欧洲介绍了中国。他们怀着惊奇和崇敬的心情详述中国政权和司法管理体制的优越性，取中国之长已成为许多欧洲人的共识。最早有关中国的论述很快就被译成主要的欧洲文字，首先引起大作家蒙田对中国热情洋溢的赞颂。17 世纪初，中国人被欧洲人描绘成政治实践艺术的大师。1615 年以后，一系列耶稣会士关于中国的报告和描述涌进欧洲，中国政治制度和实践优于欧洲的观点被一再重复，成了欧洲人脑子里定型的东西。在这个国家，除皇位以外，所有官职都“向一切人开放”，选拔官吏的尺度是个人的教育知识背景和实际才能等，与其出身的高贵低贱无关。所以，在欧洲人眼里，中国实现了柏拉图由“哲人”（philosophers）管理国家的梦想。中国人处理与邻国的关系也值得称道。他们不好战，厌战，不主张征服其他国家。不久，中国人作为“道德师”（moralists）也赢得了几乎同样的盛誉。虽然在自然科学方面乏善可陈，但必须承认，中国的道德哲学是优秀的，儒学在 17 世纪的欧洲声誉日隆。金尼阁^①和许多耶稣会作者曾就此发表过意见，有人甚至大胆地声称儒学是一种出自耶稣基督教门的最优秀的道德。到了 17 世纪末，中国人在政治艺术和伦理方面胜过基督欧洲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莱布尼兹在《中国近况》（*Novissima Sinica*, 1699）中认为，西方长于逻辑学、形而上学和对“非实体事物”的认知，在天文学、几何学以及军事学上有优势，而中国的所长——政治学和伦理学或实践哲学，恰恰是西方的所短；中国的法律完备，人际关系亲和……

然而，这一切必然要遭到宗教尤其是正统天主教卫道士的反对。承认中国异教徒听任自然之光引导便能得到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伦理和政府，这意味着对于基督教教义和教会引领人事的不可或缺性的怀疑。有趣的是，由基督教传教士引发的“中国热”，竟然产生了把欧洲人引离基督教的危险。这个结果是反讽的。当然在 17 世纪也有些耶稣会士注意到了这种危险，到 18 世纪开端反对中国热的声浪便日渐增强。必须破除中国优越论。法国天主教大主教、神秘主义神学家费奈隆（Fénelon）领头实施攻击。他们对中国的历史、文学和生活知之甚少，根本无法作出像样的判断，只好借希腊人如苏格拉底之口，谩骂中国人是地球上最愚蠢、最迷信、最自私、最不公正和最虚伪的人群。不过，所有这些努力都是徒劳

的,中国热不仅没有就此消歇,而且行情看涨。德国哲学家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721年在哈勒大学发表学术演讲,仍然宣称中国古代的皇帝和国王是哲人,中国政府的形式是最完美的,中华民族无疑要优于其他民族。还有约翰逊博士、伏尔泰等不少重量级人物,也仍然对中国文明推崇备至。

16世纪末以来的中国热为欧洲人引入中国园林及其他艺术的审美观念奠定了基础,欧洲人乐于接受一切来自中国的东西。

三

在英国,最早当然也最热情的中国推崇者是威廉·坦普尔爵士^⑥。在《英雄德性论》(*Upon Heroick Virtue*, 1683)中,他用长长一章描述中国,赞扬中国政府结构合理,监管有力,达于人类智慧、理性和发明之巅,实际上超越了所有其他人的思考,以及所有欧洲人想像的政治蓝图,如色诺芬制度、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乌托邦等。坦普尔十分热爱园林艺术,《伊壁鸠鲁园林论》(*Upon the Gardens of Epicurus*)^⑦就表达了他的园林艺术观。他说:

在园林布局中,假如知道资金比例,假如不遵循自然,那么大笔的金钱可能被莫名无效地抛弃了。我认为,遵循自然是园林布局,而且就引导我们的生活和政治而言,兴许也是一切事物的重大原则。人类该不该运用自然力,只需看看万能的上帝如何少为而治,就能做出最好的判断……

然而,坦普尔依然屈从旧例,认为最好形式的园林只与某些规则有关。只是他没有意识到,他对中国园林的描绘和赞美开启了一个历史时段,预示着下个世纪新的英国风格的诞生。

据我所知,可能存在完全不规则的形式,它的美无与伦比。这必须被看成自然的鬼斧神工,或者设计上的某种奇思异想,正是这种奇思异想可以把许多不一致的部分整合成完全一致的整体。我曾在一些地方见过这种东西,但从在中国人中间生活许久的人那里听到的更多。中国人的思维与我们欧洲人一样开阔。在我们这里,建筑与种植的美在于合乎某种比例,对称与均齐,所以我们的人行道和树木总是按这种要求设计,相互照应,间距相当。中国人蔑视这种种植方式,说能数出一百来的小孩也能把人行道的树排列在一条直线上,两两相对,间距相等。在形象设计方面中国人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这种形象的美是巨大的,冲击视觉,但无序无比例,一般不易察觉。我们几乎没有这种美的概念,而中国人则使用一个特殊的词,他们一眼撞见这种美的景致,就会说 sharawadgi 真是太好太绝了等等。谁见到上好印度长袍的制作,上好的屏风画或瓷器画,都会发现这种无序美。(坦普尔:《文集》(*Works*),第3卷,第229—230页,1757年)

sharawadgi 究竟源于何处,可能已无从查考。《牛津英语词典》称,中国学者认为,它

并不属于汉语。据一位张姓 (Mr. Y. Z. Chang) 中国学者在 1930 年出版的《现代语言注解》(*Modern Language Notes*) 中推测, sharawadgi 也许源于 sa-ro- (k) wai-chi, 可能有对随意无序的美印象深刻和惊叹的意思。

当时在英国流行的是类似于法国等地的规则园林。这种园林讲究整齐和对称。一个园林分为若干对称的区域, 每个区域都有同样的布局; 在一个笔直的平面上, 如果一头有个凉亭, 另一头也应当有个凉亭。这是典型的新古典主义趣味的园林。坦普尔对中国园林无序美的赞扬, 为突破规则园林一统天下的局面打开了一个缺口。不过, 他对此并无自觉, 不相信他的同胞能洞悉这种精致的无规则美的奥妙, 认为他们大都不敢冒失败后名声扫地的风险。

然而, 坦普尔的言论还是影响了下一代雄心勃勃的设计师, 如肯特诸人就没有如此胆怯, 而是知难而上, 大胆尝试。必须记住, 坦普尔的著述广受 18 世纪讲究趣味人士欢迎, 他是英语散文和随笔大师之一, 其作品被用作范本, 其中国园林观的影响力也就可想而知。不过也有人如梅森^⑧, 因当时英中之间政治—文学冲突的爆发而掩盖了坦普尔园林观的理论来源之一是中国的事实。虽不免带有领风气之先的怯意, 但坦普尔对无序美理念的阐释——界说, 还是要比艾迪生在《闲谈者》和《旁观者》^⑨中对人造蛮荒园林的称赞早二十来年。在就这一主题最值得注意的表达中, 艾迪生把中国园林当作他所倡导的理念的具体范例, 而这段文字几乎全取自坦普尔, 尽管无所表示。

有些作者撰文介绍中国, 说那个国度的人们嘲笑我们欧洲的植物园布局规则、线条简单划一, 因为他们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等距并排地植树。他们更愿意显示巧夺天工的天赋, 而放弃引领他们的艺术。好像他们的语言中有一个表达植物园特殊美的词, 这种植物园一眼就能激发想象, 但人们说不清道不明究竟什么东西能产生这样的效果。与此相反, 我们英国的园艺师, 不是迎合自然, 而喜欢尽力偏离自然。我们的树木, 要么是锥形, 要么是球形, 要么是金字塔形。我们的树木和灌木丛, 处处可见修剪的痕迹。(《旁观者》, 第 414 期, 1712 年 6 月 25 日)

继艾迪生之后反叛园林设计对称的人, 是浪漫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人物蒲伯。而蒲伯最早反对现代园林实践的宣言^⑩, 就经同意引用了坦普尔的随笔, 他的《致伯灵顿伯爵的书信》(*Epistle to the Earl of Burlington*, 1731) 虽未提到中国, 但其中许多关于园林的有名段落, 读起来就像是对坦普尔某些话的精确解释。

坦普尔那段文字的影响之大, 是他始料未及的。还须注意, 那段文字介绍了一个与 picturesque^⑪意思相近的中国词 sharawadgi。作为一个审美范畴, picturesque 明显有别于新古典意义上的崇高和优美, 在英语中, 除了 vague (含混或混沌) 与之语义相当以外, 就只有 romantic (传奇或浪漫) 可用了。直到 1810 年代, picturesque 才见诸文籍 (1703 年的《牛津英语词典》首次提及)。蒲伯 1712 年把它当作法语外来词使用, 却用得没那么理直气壮。奇境不限于视觉艺术。在坦普尔之后正好一个世纪, 普赖斯^⑫才在《论奇境》(*Essay on the Picturesque*, 1794) 中正式对它进行界定和解说。他认为, 与崇高的宏大和深奥、优美的平静和优雅不同, 奇境的特性是粗糙和瞬息万变, 而这是由构形、色彩、光亮甚至声音上的

无规则性造成的。

正如赫西所说,“大约在 1730 年至 1830 年间,每一种艺术形式都经历了奇境阶段,而每一种实例都是浪漫主义的一种前奏。”(《奇境》,第 14 页)在洛夫乔伊看来,浪漫主义的前奏早在 1730 年前将近半个世纪就奏响了,其突出的标志就是坦普尔那些赞美中国园林无序美的文字。这些文字在浪漫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意义是无可置疑的。理查德·欧文·坎布里奇^⑤ 1755 年的一篇文章可以为证。在贬抑勒诺特^⑥的“自然”园林之后,他说:

……在伊壁鸠鲁园林论中,威廉·坦普尔欣喜地详细评说了哈德福郡的摩尔公园,而在称赞它实用、漂亮、宏丽,是好的园林模式以后,预言般地点出一种更高级的园林风格:自由,无拘无束……这个时代特别幸运地见证了这些正义而高贵的思想的出现,规则被消除,视境被打开,乡村景色被引入,自然被拯救并被改善,而艺术则失去了自以为是的完美。(《世界报》第 18 期)

坎布里奇继续说:“不论关于中国园林的报道是真是假,可以肯定,我们是发现这种趣味的第一批欧洲人……我们的园林已经令外国人感到惊奇……”

毫无疑问,艾迪生在中国园林的特性中还是增添了一种坦普尔未曾提及的新元素。(参见《旁观者》第 414 期)。自然景观通常是不对称、不规则的,千变万化,无明显规划,坦普尔谈到了中国园林的这些特点,也曾要求园林设计追随自然,但他并未明确表示:中国园林类似于自然景观,是人工自然,摒弃一切人工雕饰。而艾迪生却推测:既然二者之间有着某些共同的抽象性质,那么它们实质上一定是相似的。他进而假定:中国园林是对“自然蛮荒”的模仿。这个假定长期流行,流传甚广,这部分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园林与英国园林实质上是一致的。但是,不论在事实还是意向上,中国园林的“自然性”实际上都遭到批评家乃至后来热烈拥护者的否定。中国的园林师意在再造自然效果的假定,无论如何都没有因为艾迪生的权威而成为定论……

艾迪生的假定遭到否定是必然的。中国人在无山处制山,无水处造水,在山水之间铺设蜿蜒曲折的小径,种植花木,建筑楼台亭阁,无处不见精巧的构思和刻意求工的雕饰。所谓“法自然”,所谓“天然去雕饰”,并不能证明人的无所作为。“法自然”的是人,“去雕饰”的也是人,人为的自然(天然),已然不是本然的自然,而是人化的自然,即人按照自己的审美趣味构造出来、无处不见人情世态的自然。这里面有规则和秩序,也有“实用理性”,尽管这种“实用理性”并非欧洲人的“理性”。人的理是“天理”,人的性是“天性”,“天理人事”,一以贯之。天是“天人合一”的“天”,园是“天人合一”的园。

艾迪生“误读”中国园林,原很自然。其实,那些熟悉中国园林的人也并非知根知底。他们看到中国园林自然随意的一面,也从中发现了人工的作用,却很难读出内含的真正的“中国观”,只是在模仿自然这个典型的西方问题上纠缠不休。李明神父^⑦在 1696 年说:中国园林看上去少有规划和雕饰,而人为因素却随处可见;他们在园中开洞,垒小小的假山,把石块堆积起来。这就是他们的模仿自然^⑧。后来把 sharawadgi 这个概念等同于模仿自然的一个实例,是伯努瓦神父(Le Père Benoist) 1767 年的一封书信。他认为中国人修饰园林运用超凡的技艺美化(模仿)了自然,他们是艺术家,施加技艺却不着痕迹而恰如其分,值